历史语境中的“变”与“不变”——《李双双小传》校勘解读

纪梦琦

摘要：《李双双小传》是李准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其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为复杂的版本变迁。通过对小说初刊本和初版本进行版本校勘可以发现，在时代环境、文艺政策、读者批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初刊本到初版本过程中作者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整体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写，实现了对喜旺形象的再塑造并逐渐完善了“农村新女性”形象的版本建构，从而在“变”与“不变”的历史语境中丰富了《李双双小传》的思想内涵与独特意义。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版本校勘；“农村新女性”

“Change” and “Constancy” in Historical Context: A Collation-Bas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of Li Shuangshuang*

Ji Mengqi

Abstract: *The Story of Li Shuangshuang* is a representative early short story by Li Zhun, and it underwent relatively complex textual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the times. Through a collation of the first journal publication and the first book edition of the 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policies, and reader criticism, the author made numerous revisions in plot, characterization, and overal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from the first journal publication to the first book edition, achieving a re-shaping of the image of Xiwang and gradually perfecting the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new rural woman,” thereby enriching,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ange” and “constancy,”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unique significance of The Story of Li Shuangshuang.

Keywords: *The Story of Li Shuangshuang*; textual collation; “new rural woman”

《李双双小传》是李准[①]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1958年“大跃进”与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农村青年妇女李双双对思想落后的丈夫孙喜旺进行思想启蒙以及在兴办公共食堂过程中与落后分子作斗争的故事，成功塑造了李双双这一富有时代风貌与理想色彩的“农村新女性”形象。小说一经发表便获得广泛好评，有评论家肯定其“不仅接触到动员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在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精神上的大解放，以及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在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的迅速成长”“在思想艺术上都有着比较突出的成就和鲜明的特色”[②]。尽管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小说因歌颂宣传了已被证明是历史重大失误的“大跃进”而遭受批评，但并没有撼动其在十七年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1961年，李准执笔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李双双》，电影于1962年公映并因受众的广泛性引发社会更大轰动，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陆续出现了豫剧、越剧、川剧、弹词等十余种剧目的戏剧改编，成功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李双双热”，作者李准也凭借《李双双》系列作品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十七年文学作家中的经典地位。李准对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以及电影到戏剧剧目的改编更是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热点。

文本修改与版本变迁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作家修改作品的动因复杂多样，既有如“‘悔其少作’或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等”内因，也有如“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等外力的作用”[③]。《李双双小传》发表后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版本变迁，但与从小说到电影改编的“研究热”不同，小说不同版本文本的变迁却鲜有人关注。这可能与作者没有在公众场合明确提出对作品的修改及修改动因有关，但对其不同版本进行校勘考察，无疑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不仅有利于我们“重返历史语境”，还原文本变迁背后的作家意识与“历史真相”，也便于重新认识与评价《李双双小传》乃至作家李准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的经典性与特殊地位。

一、《李双双小传》的版本源流

根据相关研究及资料考证，《李双双小传》共有五个版本[④]：作家的手稿本（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初刊本、初版本、1977年本和1978年本。其中初刊本构思于1958年，1960年2月完稿并发表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上，全文共约一万四千字；初版本完稿于1960年8月，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于小说集《李双双小传》中；1977年、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李双双小传》并将其分别收录于小说集《李双双小传》和《不能走那条路》中。其版本流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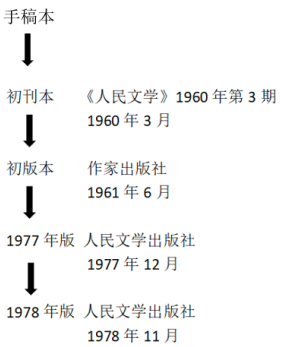


图1 《李双双小传》版本流变

①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李準一般写为“李准”，本文的写作亦遵循惯例。如具体出版物写为“李準”，则以出版信息为准。

② 潘旭澜：《谈李准的小说》，《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第31-33页。

③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④196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族语版《李双双小传》单行本，根据相关研究，内容和初刊本相同，故不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经过校勘对比，笔者发现，初刊本由手稿本增删修改而成；初版本内容以初刊本为基础，两个版本写作和发行的间隔时间虽然较短[①]，但小到标点符号、字词句，大到人物设置、故事情节、整体结构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修改变动多达 100 余处，小说后三节情节更是几乎进行了全方面改写，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故事的发展走向以及人物形象、思想主题的塑造揭示，体现出伴随历史发展作家变化纠葛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理解，蕴含着丰富的校勘阐释价值；1977 年版、1978 年版两个版本则仅在 1961 年版的基础上就情节和字词进行了少量的增补修改，但和 1961 年版相比则整体变化不大，不影响对故事主旨与作者思想的总体把握。因此，本文将主要立足于《李双双小传》的初刊本及初版本，辅之以手稿本及 1977 年版、1978 年版，对《李双双小传》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解读，并运用版本学、创作学、阐释学等理论方法，挖掘文本修改的深层原因及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思想内涵，还原李准独特的文学创作心态及《李双双小传》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特殊价值。

二、初刊本与初版本校勘解读

从初刊本到初版本，文本发生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汉语规范化时代背景下的文句推敲与艺术打磨

汉语规范化是党中央自新中国成立之时便着力强调的重点议题，50 年代以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汉语规范化运动。1955 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提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规范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因此要“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等，“要促使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有示范作用的人，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②]。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不仅会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语言的规范化，在修订的过程中对作品中存在的“不规范之处”也会着重关注。尽管李准写作初刊本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已经处于汉语规范化进程之中，但由于汉语规范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未定型性，《李双双小传》初刊本仍是存在一部分不规范文句的，再加之对于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李准在初版本中对其集中进行了修改，主要表现为错别字的修改、方言和口语化表述的删减替换、语句通顺化润色、标点符号的修改等方面。其中典型例子如下：

（1）错别字或不规范字更改：

（表比喻修辞）象➞像

刹时间➞霎时间

窜掇➞撺掇

噌噌➞尝尝

贴饎➞贴膳

扑愣愣➞扑楞楞

愣住了➞楞住了

汉字简化运动作为汉语规范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修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李双双小传》的版本变迁中即为繁简体的转化、异体字的修改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品创作修改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处于汉字简化运动的进程之中，有些修改虽然在我们今天来看仍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如“愣住了”

① 小说结尾标注，初刊本为“1960 年 2 月 7 日深夜”，初版本为“1960 年 8 月 31 日四次修改”。

②《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社论，1955 年 10 月 26 日。

变为“ 楞住了 ”），但至少在李准所处的时代来看，以上修改无疑使小说更加符合了现代汉语规范的要求。

（2）民间化、口语化表述或方言词更改：

《李双双小传》是李准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锻炼时期写作的作品，在遣词造句方面带有一定的民间化、口语化和河南方言的色彩，在增强了文本生动通俗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阅读困难。在初版本中，李准就此进行了一些修改，如：“（大字报）情往街上糊了 ”改为“（大字报）尽往街上糊了 ”、“ 多受大家香迎啊 ”改为“ 多受大家欢迎啊 ”、“ 萝葡菜 ”改为“ 萝卜菜 ”、“ 把妇女弄出来 ” 改为 “ 把妇女解放出来 ” 等等。

（3）语句的完整通顺

如 “ 端起碗来照见人影 ” 改为 “ 端起碗来照得见人影 ” ；“ 可咱们连见都没有 ” 改为 “ 可咱们连见都没有见过 ” 。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汉语规范化的时代环境与作家自身对于作品艺术精确性的追求下，李准通过对初刊本文句进行润色推敲，使初版本总体呈现出更加准确化、规范化、精致化的特点。但是规范化有时也会损害原作的艺术性，比如初刊本在描绘喜旺心里有话但嘴里说不出的时候用了 “ 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顶出来 ” 这一表述，初版本则将其修改为中规中矩的 “ 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拿出来 ”，反而丧失了初刊本口语化用语所具有的生动性与形象性。

（二）故事政治态度的变化：“ 大跃进 ” 狂热色彩与阶级话语的弱化

李准作为一名 “ 一直是在配合政治任务的，而且配合得好 ” [①] 的作家，“ 宣传党的政策 ” 是他很多小说明确的创作主题，《李双双小传》也不例外。1958 年，李准根据党组织安排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其时正值 “ 大跃进 ” 序幕揭开，在人民群众昂扬的干劲和革命意志的深刻激励鞭策下，李准完成了《李双双小传》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可以说，《李双双小传》是一部歌颂了经历史证实已是重大失误的 “ 大跃进 ” 及 “ 人民公社化运动 ” 的应景之作，带有较强的 “ 大跃进 ” 时代色彩及意识形态痕迹。但在 1961 年的初版本中，带有浓厚 “ 大跃进 ” 时代特征的 “ 食堂放卫星 ” “ 特等劳模 ” “ 跃进面条 ” “ 往北京出席群英大会 ” 等话语及李双双进行 “ 炊具机械化 ” 技术革命、喜旺吹唢呐驯养小猪等浮夸奇观情节被删除，“ 司务长 ” 被改为 “ 管理员 ” 、“ 大跃进 ” 被改为 “ 跃进 ”，初刊本中带有狂热浮夸色彩的描绘也被削减为更加客观冷静的叙述，从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初刊本的意识形态色彩。举例如下：

初刊本：今天我调到猪场，就喂了三十八头猪。到年底我们计划喂一百五十头。

初版本：今天我调到猪场，就喂了十八头猪。

初刊本：孙庄生产队夏季小麦获得了特大丰收

初版本：孙庄生产队夏季小麦获得了丰收

初刊本：就在孙庄的西边鲁班庙周围，一下盖了几千间猪舍，这是公社的万头猪场，双双她们原来在大队喂的猪，也都集中在万头猪场里。队里还盖了个繁殖猪场。

初版本：在孙庄的西边鲁班庙周围，队里还盖了个繁殖猪场。

初刊本：“咱们白天做饭，夜里搞突击！突击干它几晚上就行了！”……头一天夜里一直扫除到鸡子叫，把几堆砖头抬得干干净净。

初版本：“咱们做罢饭，突击干它一下就行了。”……头一天，把几堆砖头抬得干干净净。

初版本政治态度的变化还体现在对阶级斗争

① 为群：《新中国妇女的颂歌——谈李准同志的三篇小说》，《人民文学》1960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表 1 初刊本与初版本主要情节概述

1960 年初刊本	1961 年初版本
李双双贴大字报要求办公共食堂	李双双贴大字报要求办公共食堂
李双双喜旺因大跃进妇女走出家门问题闹矛盾（回忆）	李双双喜旺因大跃进妇女走出家门问题闹矛盾（回忆）
李双双和桂英夜谈办公共食堂终成功	李双双和桂英夜谈办公共食堂终成功
李双双举荐丈夫喜旺进食堂	李双双举荐丈夫喜旺进食堂
喜旺私自给孙有开小灶	喜旺私自给孙有开小灶
喜旺被揭发受批，思想发生转变，进入猪场劳动；李双双接替喜旺食堂炊事员的职位	喜旺被揭发受批，思想发生转变，李双双和喜旺共同进入食堂担任炊事员
李双双发现富裕中农孙有在家中私藏水车并与其作斗争	李双双和喜旺发现富裕中农孙有在家中私藏水车并与其作斗争
李双双在食堂进行炊具改革、粗粮细吃，发明“多孔台阶式煎饼灶”，与“促退派”金樵作斗争	李双双和不赞成“粗粮细吃”思想落后的喜旺作斗争，“粗粮细吃”获得成功、李双双受表彰并对喜旺进行思想教育，使喜旺发生思想转变，喜旺发明“多孔台阶式煎饼灶”
李双双食堂“粗粮细吃”成果获得群众赞赏，喜旺在猪场大放异彩，两人相约携手共进共上北京	李双双和喜旺食堂“粗粮细吃”成果获得群众赞赏

话语及阶级矛盾的删减与弱化上。初刊本中贫农和富裕中农、封建地主恶霸的阶级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以老支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李双双为代表的贫农们和富裕中农之间的尖锐阶级斗争是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初版本中，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富裕中农”被“思想落后者”等更温和的话语所替代，对其房屋由“征用”改为“租借”，初刊本中人民开群众大会批斗富裕中农孙有私藏水车，“辩论到孙有承认了自己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情节被删除；同样是关于红薯能否“粗粮细吃”的争论，在初刊本中反映为李双双和“促退派”富裕中农金樵之间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激烈阶级矛盾，而在初版本中，则转变为喜旺和李双双夫妇因为食堂红薯浪费现象意见不合而导致的生活矛盾，文本“大跃进”背景下狂热的阶级话语在删减、转移中走向了弱化。

初刊本：要是认不清那些富裕中农，他何止光想沾食堂点光呢！叫他想着食堂垮了才好。

初版本：要是认不清有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他何止光想沾食堂点光呢！叫他想着走回头路才好。

初刊本：也不会上那些富裕中农和坏蛋们的当了。

初版本：也不会上那些有落后思想人的当了。

（三）喜旺形象的再塑造

随着作品政治态度的变化，初版本中的主要矛盾也从李双双与富裕中农的公私斗争转移到夫妻两人的生活矛盾以及李双双对喜旺的思想启蒙的改造上，作家在矛盾转移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喜旺形象的“再塑造”。喜旺形象的重塑主要是通过小说后三节情节的变动体现出来的，现将两个版本的主要情节概况列举如表 1。

通过两个版本情节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初刊本和初版本前半部分情节为我们塑造出的喜旺都是有着较为深重的传统夫权思想和性别分工意识、对党的政策和集体利益缺乏充分认识和足够热情、思想比较落后的传统农民和丈夫形象。他敬畏党的政策、发自内心尊重作为党的政策发言人的老支书，但相比集体事业更注重维护个体小

家庭的利益；他喜爱欣赏李双双火辣爽利的性格和出挑的劳动能力，但不认同甚至反对妻子在家务之外的公共事务中展现个体能力和价值；他看不惯富裕中农孙有私用集体财产为自己谋利益的行为，但出于爱面子、怕惹事、怕得罪人的“老好人”思想，不仅未能对其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大胆揭发反而在无意中“助纣为虐”，其性格“有鲜明的阶级特色，又有旧习惯的烙印”[①]，实质上体现了建立在复杂人情关系基础上的乡村民间伦理的“私”的观念。而这种“私”不仅和李双双“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是夫妻两人冲突的焦点所在。因此尽管他身上具有传统农民憨厚、勤劳、朴实的一面，但和李双双这一“新人”形象对比，无疑是落后的，是需要“被启蒙”“被改造”的“旧人物”。

在基本铺垫完成喜旺“落后”的人物形象和李双双“先进”的人物形象后，作家便开始着力展开李双双对喜旺由“落后”到“先进”的改造之路。通过对比初刊本和初版本可以发现，在喜旺私自给孙有开小灶被揭发、喜旺受李双双批评这一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情节，两个版本的内容发生了分化。初刊本[②]的喜旺在接受了李双双关于“政治挂帅”的思想教育后，迅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要求写大字报作出检讨，并说出了“人十七还能长十七，十八也不能长十八”的改变宣言。他主动请缨接替李双双原本在猪场的工作，“在展开夫妇交叉换位格局的同时，完成了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③]，猪场线索和食堂线索并进，夫妇两人分别在不同环境做出贡献大放异彩，为我们展现了夫妇两人“你追我赶”追求“政治挂帅”的过程。但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小说中喜旺思想转变的前提是自己错误行为被群众大字报揭发而引起的害怕和羞愧，“喜旺是个胆小的人，一见大字报，先吓一跳”，老支书也对喜旺做出了“他不想干算了。他这人也太拉塌了”这样较低的评价，并将其剔除了食堂工作的行列，这说明老支书实质上是并不认为喜旺有在短期内思想改变“政治挂帅”的可能的。李双双的初步教育也并未完全完成其思想启蒙过程，在李双双发现孙有私藏水车，孙有半夜找喜旺帮忙隐瞒并许诺可以“共用水车”时，初刊本中喜旺的回答是“我对你说，咱们两个根本不是一条道，你赶快给我走，你知道，李双双可不是好惹的”，孙有逃走后喜旺心里则想的是“他走了算了，咱只要不跟着他走邪路”，由此可以看出喜旺拒绝孙有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妻子的畏惧以及无愧于心洁身自好的自我要求而不是对集体利益的自觉维护；李双双在和时任食堂司务长的“促退派”金樵因“粗粮细吃”问题产生矛盾时，喜旺的反应是“双双，我有点替你操心哪，那小子上过几天学，又是个干部。他是司务长，你是炊事员，咱今天给他弄这个下不来，以后……”，以上言行均说明其落后思想仍未完全转变，但初刊本后续对喜旺思想的转变过程也并没有进一步呈现，既没有展示李双双对于喜旺进一步的影响教育，也没有展示喜旺对李双双从“俺做饭的”到“我一定要赶上你”这一态度转变的深层心理原因，而是在结局直接展现给读者一个“蜕变后”的喜旺形象，这也就导致喜旺思想转变的过程较为生硬，缺乏了一定的真实性，也未能深刻突出李双双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启蒙作用。

① 李凖：《情节、性格和语言——在旅大市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鸭绿江》1963 年第 1 期，第 105、106 页。

② 李凖：《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1960 年第 3 期，第 11—22 页。

③ 陈欣瑶：《“李双双”始末——40—60 年代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 年，第 14 页。

而在初版本[①]中，喜旺犯错误后老支书对其的评价由“太拉塌了”转变为“喜旺他不能在里面领。他这人要别人领着他干才行”，对其性格的评价由负面转向了中性，且保留了其为食堂工作的机会，这就首先为其后续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性格上的合理性以及党这一更高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可性。而喜旺在接受完李双双初步的思想教育后，虽然深感惭愧，但传统性别意识和小农思想并未完全消除，他不再如初刊本中主动要求而是在李双双的强制要求下写了大字报作检讨。他由于性别意识并不愿意和李双双一起进食堂工作，在李双双的反复劝解下才“慢慢想通了”，并且要求李双双“到食堂后，说话可软和点，别把人都得罪完了”，“老好人”的旧式人际观念仍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中，也预示了其思想改造的漫长性与困难性。由此推进，初刊本中喜旺进猪场的线索被取消而代之以和李双双一同进入食堂，喜旺作为主要人物和李双双共同参与了发现孙有私藏水车并与其斗争及食堂“粗粮细吃”实验的全过程，在与落后分子斗争过程中目睹并为妻子李双双为维护集体利益敢于斗争、大公无私的美好品质深深感染，从而拉进了和李双双之间的叙事距离，更加突出了李双双在喜旺思想启蒙和改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面对孙有“私藏水车”的求情，喜旺的拒绝更加坚定，拒绝原因由对妻子的畏惧转变为对阶级立场和集体利益的坚定：“我对你说，咱们两个根本不是一条道，你赶快给我走！往后你姓你的孙，我姓我的孙，你别在这穷嘀咕了”。尽管“咱只要不跟着他走邪路”的洁身自好心理也仍然存在，但与从前自私自利的喜旺相比，其思想境界已经得到极大提升。为了进一步突出喜旺在李双双影响下思想变化的过程，增强形象的真实性，在面对公共食堂红薯浪费现象时，初刊本中大力支持“粗粮细吃”实验并提出红薯面条具体制作方案的喜旺在初版本中转变为拖慢食堂改革进程的落后者（与此对应，初版本中制作方案由四婶提出），承担了初刊本中金樵的落后角色和落后言行。但初版本中矛盾的核心已经不再是“促退派阻碍办好食堂”的阶级矛盾而是喜旺不满于群众“挑嘴浪费”行为与李双双希望“让群众吃好”的生活矛盾，两人的出发点都是“避免粮食浪费行为”，是维护公共食堂集体利益责任意识的体现，只是喜旺“不吃也没办法”忽视群众心理简单粗暴思想和李双双真正关注群众需求的做法相比无疑还是“不够先进”“需要改造”的。通过上述改写，喜旺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过程被进一步拉长，而实验成功后李双双和四婶等劳动妇女的智慧和为集体利益刻苦奋斗的精神也让喜旺感到了真正的“服气”与赞叹。

红薯“粗粮细吃”实验成功后，李双双受到公开表扬，初版本较初刊本增添了这样一段情节，可以说正是这段情节促成了喜旺思想的最终转变：

喜旺说：“你看你如今县里也去开过会了，报上也登过了，广播里三天两头表扬你，我只能拉马绳蹬，永没有出出头那一天！”双双听他这样说，噗哧笑了。原来喜旺也想跃进跃进呢，可是他这个看法却不对。双双就对他说：“我去开会，是代表咱们孙庄食堂去的，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再说去开会是为了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怎么能算去出出头？你真是想要去‘出出头’，这个会还不敢叫你去开呢！”她这么一说，喜旺脸红了。双双急忙又说：“什么事情，不能从个人想起，要为大家。你只要好好劳动，想办法把群众食堂办好，不要说县里，省里，北京你也能去！可是你心里就没有把食堂办好这一格，还想着要出出

① 李准：《李双双小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第 33—46 页，第 169 页。

头，那当然不会有那一天。”接着双双又向他讲了几段劳动英雄故事。

喜旺仔细听着想着，觉得双双的话有道理。照他原来想着，如今人不为钱了，还要为个名。可是照双双讲的，这图个名也是不光彩。只能是为工作，为大伙，为社会主义。喜旺想到这里，觉得和自己结婚十多年的这个老婆，忽然比自己高大起来，他不由得嘴里溜出来一句话：

“劳动这个事，就是能提高人！”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李双双对喜旺精神层面及思想转变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从一个具有浓厚夫权伦理与保守落后思想的农民真正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人”。初刊本中过早出现的“人十七还能长十七，十八也不能长十八”改变宣言也在其后自然引出。1977 年版还在 1961 年版基础上增添了一段喜旺对李双双的由衷赞美：“我说你变了，双双，变得聪明了，变得能干了也变得通情达理了，你那个思想比我高。你想想你从前来咱家是个黄毛丫头，可现在你就象另外换了一个人”[①]，由此可见喜旺对于李双双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品质的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从称呼李双双为“俺做饭的”到自称“李双双那个爱人”，李双双用自己的行动真正在喜旺心中获得了“姓名”。在此激励下喜旺取代了初刊本中的李双双成为“多孔台阶式煎饼灶”的发明者，通过在饭馆时学徒的经验及自己的智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和李双双一样成为时代所呼唤的“劳动英雄”、“社会主义英雄”。而由初刊本结尾夫妻两人“你追我赶”相互鼓励共进去北京、参与群众大会接受表彰到初版本的既不为钱财也不为荣誉只是“为工作，为大伙，为社会主义”这一带有共产主义浪漫色彩的终极奋斗目标，小说通过对喜旺形象的“再塑造”，最终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真正内涵层面上实现了升华。

（四）李双双“农村新女性”形象的生成与版本建构

通过《李双双小传》各个版本之间的校勘解读可以发现，尽管不同版本之间在故事情节、人物设置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作家对李双双这一“农村新女性”形象的主体建构及传达出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主题却是较为稳定的。“农村新女性”是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形象，其产生与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对于以家庭为主要活动中心的传统农村女性这一潜在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需求密不可分，在此种时代背景下，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根本指向的“妇女解放”，就成为包括《李双双小传》等诸多小说的思想核心。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模糊了性别特征的“铁女人”，小说中李双双这一“农村新女性”形象在符合时代需求的同时又彰显出独立鲜明的女性个体意识，从而使这一形象在艺术价值上超越了文本思想内容本身，也使小说能够超越经历史检验已是重大失误的“大跃进”的颂歌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那李双双这一“与众不同”的“农村新女性”形象如何通过文本建构生成的呢？小说版本的变迁对于其形象的塑造及“妇女解放”这一思想主题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节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李双双小传》创作于“大跃进”时期，但“李双双”这一“农村新女性”形象却是作家从多年农村生活中积累提炼的结果。作家在农村集体生产中发现的具有大公无私性格的“女性新人”是“李双双”的最初源头，而借书写“一位炊事员的模范事迹”而发扬光大新人“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则是作家对于小说主题的最

① 李准：《李双双小传》，第 364 页。

初构思，此时的主题仍然停留在配合塑造新人形象的政治要求层面，小说中李双双性格的主要基调也由此奠定。而随着“ 大跃进 ”的推进，“ 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智慧上一次达到解放，大的喷发，它特别表现在劳动妇女的精神面貌上 ”，作家在土改时期看到的传统农村妇女走出了家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①]，农村妇女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性格解放带给作家深深的触动，使作家开始思考其性格转变的原因及人物形成的社会环境，并将创作重点转向对于“ 农村新女性 ”形象的建构及“ 妇女解放 ”的思想主题上。为了更好地突出李双双的“ 变 ”，作家将“ 解放 ”前的李双双设定成传统中国农村女性的典型形象并将其放置在传统农村典型夫妻关系之中：17 岁嫁给丈夫孙喜旺，“ 年纪轻轻地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 ”，在传统“ 男主外，女主内 ”家庭性别分工和夫权伦理控制之下，不仅一直深陷于繁重的家务劳动、日常琐屑事物之中，在社会关系中也一直是作为“ 喜旺媳妇 ”“ 俺那个屋里人 ”“ 俺小菊她妈 ”“ 俺做饭的 ”等丈夫的客体和附庸而存在的。新中国的成立和婚姻法的颁布使她在国家政策层面获得了独立地位，在民校的学习使她获得了初步的思想启蒙，“ 大跃进 ”的时代环境则为其“ 走出家门 ”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她有着“ 走出家门 ”投身公共劳动的强烈愿望，但其所处的以父权夫权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农村家庭形式使她面临着家庭内部劳动和家庭外部的公共劳动的冲突矛盾。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②]。而通过李双双贴满了屋子的“ 我真想学习呀，就是没时间 ”“ 啥时候我也能不做饭，去参加大跃进 ”的小字条，我们既可以看出李双双投身公共劳动的强烈愿望，也可以看出李双双对于家务劳动和公共劳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自我掌控的渴望及由此展现出的朦胧的个体觉醒意识。

农村女性所面临的个体私人化的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代表着传统夫权社会中男性价值与女性价值的矛盾。在传统夫权观念中，“ 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 ”，带有妇女的专属性及性别歧视的烙印，而作为“ 家庭掌权者 ”的丈夫孙喜旺，即使曾作为“ 山北白木店大镇上馆子 ”中“ 做菜的高手 ”，即使在妻子已经因社会劳动而“ 忙成这样 ”而自己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仍拒绝参与做饭这一简单的家务劳动，并理直气壮地说出“ 那是你自找，我可养活不起你啦！ ”。这一系列行为实际上代表了作为夫权象征的孙喜旺试图“ 驯服 ”李双双、使其回归家务劳动，回归的传统农村女性本职和男子附庸客体本质的意图。这无疑是和李双双“ 走出家门 ”的朦胧个体解放意识是相冲突的，但传统农村语境却没有给予其对夫权话语的“ 合法化 ”的辩驳途径，也让她发出了“ 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 ”的无奈呼喊。

李双双的困境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和农村妇女普遍的困境：一方面，“ 大跃进 ”要求男女无差别作为劳动力投身社会主义劳动和建设当中，呼吁能够走出家门的“ 农村新女性 ”的出现；另一方面，传统夫权思想及家庭性别分工在农村仍是根深蒂固，政治语境与时代环境下

① “我记得第一次产生创作李双双这样人物的冲动时，我给自己说：‘这真是农村中活生生的新人！农村集体生产需要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可是当时还停留在写一个模范坎事员的角度上。”李准：《情节、性格和语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62—64 页，第 64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72 页。

的变革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对传统农村进行解放，具有真正个体解放意识的“农村新女性”在传统道德伦理中仍缺乏合法性依据。在一次偶然的邻里谈话中，李双双得知了其他地区公共食堂的成功建立的消息，这使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领悟到“真正走出家门”的合法化途径，她用一张富于时代与政治色彩的大字报，大胆地发出了妇女走出家门、投身公共劳动、获得个体解放的诉求：

家务事，
真心焦，
有千劲，
鼓不了！
整天围着锅台转，
跃进计划咋实现？
只要能把食堂办，
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

从“小字条”到“大字报”，从“很少能上地里做几回活”到“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李双双”成功将自己“跃”了出来，一张署了名的大字报使其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主体现身于公共领域，也象征了这一“农村新女性”主体的真正出世与叙事的展开。通观全文，尽管李准在小说中有意识强调李双双对“大跃进”以及兴办公共食堂的热情是出于阶级觉悟以及对国家号召的响应，比如强调其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以及与金有、孙樵等试图危害集体利益的富裕中农落后分子的积极斗争等等，但透过叙事文本的缝隙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摆脱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和性别分工，亦是李双双渴望“走出家门”的重要动因，体现了作者对于真正具有个体意识的“农村新女性”形象主体性建构的探索性凸显。而李双双之所以能够真正“走出家门”，则是通过借助国家政治话语来实现的。

兴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顺利进行的要求和保障，其背后是高于家庭伦理的更高层的社会意识和伦理逻辑，正如罗支书所说：“要是能把家庭妇女弄出来，咱们这个大跃进可就长上翅膀了”。李双双在大字报中巧妙地将个人性别解放的困境转化为“跃进计划咋实现”的全民公共困境，从而使其冲破传统性别分工、挣脱家务劳动束缚、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具有了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由国家政治和时代要求赋予的“合法性”也成为李双双大胆对抗夫权伦理的重要保障，夫妻两人因家务劳动争吵并大打出手时，“喜旺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出气”，“却被双双扭住他说：‘走！咱们去找老支书说理去！就是兴你这样；我参加大跃进你不愿意，你嫌不舒坦，不美气，故意找我岔子，你这是啥思想！’”，喜旺面对象征着国家政治话语的老支书，只能是“自己知道理短”“却先溜了”。公共食堂的兴办则承担了家庭的部分职能，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生活模式。而喜旺成为公共食堂的炊事员，使双双从“俺做饭的”到也能吃上喜旺做的饭，打破了以“做饭”为代表的家务劳动的妇女专属性及凝聚于其中的性别歧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国家“大跃进”政治话语和时代要求下的产物，李双双的“解放”则是对这一产物巧妙借用的结果。喜旺的夫权伦理在国家大势下逐步走向了妥协，对李双双发出了“你现在算是熬成人了”既无奈又钦佩的慨叹。

在作家主体意识参与创造和国家政治话语的指引干预下，李双双跃出了传统夫权束缚，正式走出家门，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实现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自己的无私无畏、昂扬拼搏的精神引领丈夫不断“政治挂帅”，使喜旺的思想完成了从“女人家，她懂得什么”到感到“俺做饭的”这个称呼是多么背时再到小说结尾“我一定要赶上你”的转变，从而完成了

对丈夫喜旺的反向“ 驯服 ”与思想启蒙，体现了作家对于塑造既符合时代需求又具有真正个体解放意识的“ 农村新女性 ”形象的探索性尝试。

分析完李双双这一“ 农村新女性 ”形象在小说中的生成建构方式，我们进一步分析版本变迁对于其形象的影响。通过不同版本对比校勘可以看出，作家对于李双双这部分最关键性格的塑造和形象建构主要体现了小说前半部分①，不同版本之间的内容并无太大差异，因此《李双双小传》不同版本在“ 农村新女性 ”及“ 妇女解放 ”思想主题层面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内涵。但伴随着版本变迁过程中“ 大跃进 ”阶级色彩的弱化，李双双身上作为“ 新人 ”所具有的激进色彩和阶级斗争意识也不断被削弱，小说手稿中在双双出场时交代她之前在辩论会上就批评过富裕中农孙有，在李双双揭露孙有私藏水车后，还有一段老支书与双双谈话，鼓励其积极参与为党为群众的斗争，发展其入党的内容②；而在初刊本中这两部分均被删除，但保留了对孙有因“ 私藏水车 ”和“ 粗粮细吃 ”而批判斗争的情节；而在初版本及其后的版本中，就“ 粗粮细吃 ”问题进行阶级斗争这一部分也被删除，李双双的形象内涵也在意识形态话语删减过程中逐渐发生了一定偏移。

李双双与喜旺夫妻关系的变化在李双双形象的主体建构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同版本间喜旺形象的变化也促进了李双双形象内涵的发展丰富。作家力图通过李双双和喜旺之间的关系变化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通过李双双与喜旺的斗争完成“ 新人物 ”对“ 旧人物 ”的思想启蒙与改造，李双双在夫妻关系中是以更高的“ 启蒙者 ”姿态出现的（尽管在初刊本中李双双对于喜旺的启蒙较为生硬），她独立发明“ 切菜机 ”“ 淘米机 ”“ 台阶式六个孔眼的煎饼灶 ”进行炊具机械化改造，并入选全县特等劳模，独自自主地走出一条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之路；而随着初版本中叙事重心进一步向李双双和喜旺之间的夫妻性格矛盾斗争的转移，李双双和喜旺互动关系增强，夫妻两人的地位在喜旺形象的提高与“ 再塑造 ”过程中逐渐走向平衡，由初刊本中喜旺对李双双的单向追赶变成夫妻二人你追我赶。为配合文本变迁，初刊本中李双双进行炊具机械化改造等情节被删除，原本由其发明的“ 台阶式六个孔眼的煎饼灶 ”也被转移到丈夫喜旺的名下，而 1977 年版本结尾中“ 先结婚，后恋爱 ”③情节的插入更是将李双双对喜旺的思想启蒙赋予了民间伦理的意味，李双双身上所体现出妇女解放面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收紧。

三、初刊本到初版本变迁原因探析

通过上文对于《李双双小传》初刊本与初版

① 茅盾在《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中指出：“七、八（李双双发现富农孙有私藏的水车到炊具机械化运动，双双被评选为劳模）两节虽然写得灵活，没有平铺直叙的毛病，可是，从描写人物的角度来看，这两节不起多大作用。”

② 手稿本：“散会后，老支书把双双叫到办公室里说：“双双，咱们为什么要和孙有辩论？”双双说：“就因为他要走老路。老路是少吃没穿痛苦路，大伙要走社会主义幸福路。因此就得和他辩论这个路。”老支书说：“说得对。（可是要走社会主义路，必须跟着共产党。）”接着他向双双谈了一阵（党员的标准），最后给了她一张表说：“（前些时候你不要求入党吗？支部已经研究了。今后只要好好工作，能为党为群众斗争就能入党。现在）你把这张表□回去填上吧，填好以后交给你进大娘，晚几天支部讨论。”

双双接住表以后，走出了办公室，也不知道是刚参加辩论会后的兴奋，还是刚才老支书和她谈话使她激动。她只觉得脸上热烘烘的，身上轻飘飘的，连天上的满天星斗，都像在对着她笑。她头一次感到，一个人活在世上是这么有意思，这么重要。”

转引自：程凯：《“再使风俗淳”——从李双双们出发的“集体化”再认识》，《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 年第 5 期，第 100 页。

③1977 年版《李双双小传》结尾处增添了这样一段情节：双双感动地深情地说：“那你不也变了！我就觉得我比以前更爱你。”她说着又笑嘻嘻地说：“喜旺，你看咱俩象谈恋爱！”喜旺正经地说：“就是搞恋爱，他们青年们是先恋爱后结婚，咱们是先结婚后恋爱。”说着两个都高兴的笑了。

本的版本校勘，可以发现版本变迁的核心即为“大跃进”狂热色彩、阶级斗争话语的弱化与喜旺形象的“再塑造”，体现了作家李准在文本修改过程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而作为一名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在文坛大放光彩的青年作家，依托时势和政治导向“反映现实”、配合政治运动、歌颂党的政策是李准创作的自觉追求，同时，扎根农村锻炼生活的经历使其对农村的社会现实及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体验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二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统率之下实现了结合并反映于作品当中。尤其对于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两篇“暴露和鞭笞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而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的作家来说，宣传歌颂国家“‘大跃进’”政策，响应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文学作品“要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作斗争，要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抵抗的各种思想作斗争，对人民中间的各种怕困难、保守自私等落后意识作斗争”[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③]、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号召更成为作家创作《李双双小传》重要乃至根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李双双小传》所表现的内容与小说创作的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艺政策和农村社会现实状况息息相关，而作家于版本修改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也深刻受到了时代环境与农村现实发展变化的影响。那么小说版本变迁背后的社会现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具体影响到作家并体现在作品当中的呢？为了厘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大跃进”在全国（尤其是小说背景的河南农村）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

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④]，党中央正式通过报纸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大跃进”及与之相配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也逐渐产生了浮夸风、共产风等不良风气。而李准下放的河南，作为“大跃进”的模范地区，“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和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省”[⑤]，也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据史料记载，1958年南宁会议后，河南省委向地县部署“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当年实现纲要规定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⑥]并建立了大量公共食堂，“据1959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村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的有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省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97.8%，居全国首位”[⑦]。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农村社会的如日

① 金汉：《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②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第18页。

③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第3页。

④《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

⑤ 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46页。

⑥ 张湛彬等：《“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第21—23页，第340页，第356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

中天，阶级斗争也在激烈发展当中。1958 年 5 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断言“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而在农村社会，两条道路的斗争核心就是“ 一部分富裕中农和一部分干部中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有很多文章指出，当时“ 农村中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还没有真正服气 ”[①]，企图“ 推翻人民公社、否定大跃进 ”，因此必须“ 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鸣放辩论 ”“ 与一部分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②] 进行激烈斗争。而事实证明“ 大跃进 ” 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违背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犯了“ 左倾 ” 错误的重大失误，也导致了 1959 到 1961 年长达三年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党中央也初步进行了一些“ 纠左 ” 的尝试，但总体而言还是局限在坚持“ 大跃进 ” 和人民公社的“ 左 ” 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1959 年的庐山会议更是由“ 纠左 ” 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 反右倾斗争 ”，在“ 反右倾 ” 思想的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对经济形势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并在 1960 年初提出了“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 的口号 ”，要求实现“ 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 ”。

于 1960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政策“ 代言人 ” 的李准，对上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接收学习党的政策，对下则能够在劳动锻炼中亲身观察体验到党的政策对于农村的巨大影响及农民各方面的变化，尽管在初刊本写作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大跃进 ” 已经呈现衰颓之势，但在强大的“ 左倾 ” 时代风气以及配合党的政策、歌颂时代新人的创作态度的影响下，其创作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 大跃进 ” 时期的意识形态痕迹，表现在初刊本中即为兴修水利、建立公共食堂、办民校、消灭“ 四害 ”、工具革命、粮食大丰收等极具有“ 大跃进 ” 时代风貌和浮夸色彩的描写以及以李双双为代表的贫农们对孙有、金樵等“ 企图走资本主义老路 ” 的富裕中农的尖锐的斗争当中。

而在李准写作初版本的时期（1960 年中下旬），整个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家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0 年初期“ 大跃进 ” 政策的继续推行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困难，粮食问题是最突出的表现，“ 1960 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这年秋收将要到来的时候，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已成定局，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 ”[③]。加之 6 月份中苏关系的破裂，国民经济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和失调当中，“ 大跃进 ” 实际已走向全面破产。严峻的现实使党中央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政策，1960 年 6 月 8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题为《十年总结》的文章，“ 重新倡导‘ 实事求是 ’ 原则，对钢铁生产中的高指标和农村工作中‘ 一平二调 ’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提出：‘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 ”[④]。国民经济开始逐步进入调整时期，并首次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 的八字方针。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初刊

① 龚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政治与经济》1960 年第 1 期，第 20 页。

② 社论：《必须取得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创造》1959 年第 12 期，第 5—8 页。

③ 张湛彬等：《“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年，第 21—23 页，第 340、356 页。

④ 同注①。

敝待兴的社会更亟需呼唤真正具有大公无私品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出现并投入社会建设与理想复兴当中，于196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强调即是对这一现实状况的呼应，大会所强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更是对李准带来了深刻的思想洗礼。他在初版本《李双双小传》后记中写道：“掌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绝不只是个技巧问题。而是一个作者对他的时代，他的阶级热爱和感情倾注程度的表现；是他的党性的责任心在文学中作用的表现……最近我参与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我觉得这是我在学习中体会得最深刻的一点，所以也愿意在这里表白给读者同志们。”[①] 有学者很好地解释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的精神实质：“革命的浪漫主义要求在艺术上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与品质。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但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正成长着无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新人新事，共产主义因素已经不是少量的个别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已经不是远景而是近景，我们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必须首先描写这些生活中最先进的人的思想和事物。”[②] 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作者在初版本修改写作时不再拘泥于社会政策的图解，而是更加着力于对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特质的“新人物”“新英雄”的探索塑造。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李双双，其“新人形象”在初刊本中就已塑造得较为饱满成功，在此前提下，作家把目光转向在初刊本中以“落后者”形象存在的普通农民喜旺，尝试探索与李双双不同的农村“共产主义新人”建构途径并以此将喜旺纳入“新人序列”。于是，作者“进一步研究作品的主题，研究双双和喜旺这两种性格冲突的本质”，发现“这个主题上还蕴蓄着更加重大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中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从写人出发、从写性格冲突出发，把这两个人换到什么地方都可以”[③]。作家通过探索发现，喜旺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过程与其和李双双的互动关系密不可分，而李双双身上所具有的“新人”的美好品质及其行动是促使喜旺转变的根本因素，因此，作家在初版本写作时便将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向为李双双和喜旺这对夫妻之间的性格冲突，在拉进两人叙事关系的同时着力强调李双双对喜旺的思想启蒙与改造的过程，最终成功完成了对喜旺形象的“再塑造”，为我们呈现出李双双和喜旺这两个“不为名利只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农村新人”“社会主义英雄”形象。这种探索无疑是有独特意义的，放眼1960年代初期的农村现实社会，相较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长为“新人”的李双双，以喜旺为代表的“落后农民”及其背后“私”的民间伦理意识无疑更加占据主流地位，是影响“新人”能否普及化以及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而通过初刊本到初版本对于喜旺形象的“再塑造”，作家完成了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探索性尝试，也体现了作家对于1960年代农村社会现实更深度的思考与期盼。

小说后半部分的大规模修改和读者的接受批评也是分不开的。小说在《人民文学》一经发表就获得了知识分子界的广泛好评，但也有部分批评者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意

① 李准：《李双双小传》，第33—46页，第169页。

② 李焕之：《谈革命浪漫主义》，《人民音乐》1958年第10期，第5页。

③ 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6日。

见，如冯牧于 1960 年 10 月发表在《文艺报》中的评论指出：“ 在这里需要提出的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两条不同的斗争线索当中，和孙有父子所进行的属于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是描写得不够精炼和略嫌拖沓的；因此，整篇作品的后一部分比起前面来就显得有些粗疏和草率了。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作品在艺术结构的完整和匀称上受到了一些影响 ”[①]。茅盾在《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中也指出了类似问题：“ 七、八（李双双发现富农孙有私藏的水车到炊具机械化运动，双双被评选为劳模）两节虽然写得灵活，没有平铺直叙的毛病，可是，从描写人物的角度来看，这两节不起多大作用。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的后小半部略显松弛，不及前大半部那样层层转进，峰峦重迭 ”“ 如果能在适当场合多渲染气氛，更好地渲染气氛，同时删改或压缩一些平板的叙述和交代（例如第六节的开头一小段，第八节的开头五小段），那么，这篇作品的抒情味将更见浓郁 ”[②]。由此可见，评论者普遍认为初刊本后半部分对公私阶级斗争的描绘是不够成功的，李准自己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 这篇小说后半部写得不好，将来还要改改 ”[③]。虽然作家没有在公众场合明确提出自己的修改动因，但我们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合理推测可以得出，在时代变迁、文艺政策、读者批评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下，李准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改变，完成了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改写。

结语

通过对《李双双小传》初刊本和初版本的对比校勘，我们发现李准对初版本进行文句润色修改、弱化大跃进狂热色彩和阶级斗争话语、对喜旺形象进行再塑造并丰富了李双双形象内涵的同时，保留了对李双双这一既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个体意识的“ 农村新女性 ”主体建构的精神内核。挖掘两个版本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的“ 变 ”与“ 不变 ”，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时代背景、文艺政策、读者批评、作家亲身经历与主观意志等因素对于作家创作和作品改写的重要影响，更可以透过这曲“ 大跃进的颂歌 ”的表面对这部作品及蕴含于其中的作家的思想意识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于我们重返时代语境，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认识与再评价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作者简介：

纪梦琦（2001—），山东青岛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2026 届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冯牧：《新的性格在蓬勃成长——读〈李双双小传〉》，《文艺报》1960 年第 10 期，第 29 页。

② 茅盾：《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 年第 4、5、6 期，第 74 页。

③ 李准：《情节、性格和语言——在旅大市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鸭绿江》1963 年第 1 期，第 105 页，第 106 页。